

耕耘者

上
卷

彭颂声著

心里充满着爱

賴士其選

第一輯



心里充满着爱

彭颂声著

耕耘者书丛·第一辑

心里充满着爱

彭颂声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商标装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5.75插页 2 字数 119.000
198年 月第 版 198年 月第 次印刷
印 数：1 — 4520册

ISBN 7—5407—0469—1/I.351

定价：2.30元

序

秦 牧

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年年新进入文艺竞赛场的人这么多。不时有些新人的文学新作出版，是自然不过的事。

这本《心里充满着爱》，是彭颂声同志的第一个散文集。它包括小品、随笔、报告、札记等数十篇，是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多年来所写散文的结集。

彭颂声现在是《深圳特区报》的文学编辑。他把大半生都献给教学、编辑事业，只在业余时间偶尔动笔，结果，到了中年的时候，才献出这个集子。

五十年代末，当我在羊城晚报工作的时候，一天，有一群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访问我，他们是来调查、了解我的散文写作状况的。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当时还是小伙子的彭颂声。

此后，彭颂声经常给我来信，他客气地称我作“老师”（这自然是我所担当不起的）。由于他的诚恳、好学、善良和天真，使我和他时常通信。直到现在，他已成为头发稀疏的中年人，这种通信关系仍然保

持如昔。一次见面之后，断断续续通信达二十几年，这在我是很罕有的事。其所以如此，由于我为他的那点精神所感动，不想让他失望。再说，象他这样的人，和“长袖善舞”、“善于钻营”、“翻云覆雨”、“随风驶舵”者的品格距离很远，是决不会风云际会，扶摇直上的。对于这类有点憨厚（由于这一点，他说话有时并不很得体），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物，我素来怀有同情之心；也知道在交往之中，决不会被使绊子，受暗算的。因此，也就信任地经常和他通问了。

他毕业后被派到粤东山区教高中，而且一教就是二十多年。虽然成了优秀教师，生活却是经常穷困的。在这样悠长的教学生涯中，生活上的艰辛自不待说了，十年动乱中还得经常捱斗。如以世俗的眼光看来，这真是幸福无缘，受罪有份。但是难得的是，他一直认真工作着，并不因此而敷衍塞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贯彻，他到特区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之后，生活才逐步好了起来。

我并不想为了给一本书作序，就把书里的文章说得天花乱坠。我想说的，是作者的文笔相当熟练，各篇题材，涉猎也很广泛。字里行间，常跃动着一种真挚的感情。这点“真”，就使作品提高了可读性。例如《屐音》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

“游街示众”早已磨老了脸皮，哪管它修不修边幅，而进入农贸市场，问知米价又飞涨了，压根儿就

比上大台挨斗还要心惊肉跳。此无它，只因为耳畔有着孩子嗷嗷待哺的声音。不用问，那年月我连一双稍为象样的凉鞋也没有，不想当“赤脚大仙”，还能不穿木屐么？只是，近几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我终于有了美观锃亮的牛皮鞋，那木屐才被我搁在“家庭博物馆”里。

象这一段文字，即可视为率真的文笔，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的一例。类此的笔墨是不少的。加上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对真善美的向往，使他的作品有一定的特色。

由于具备这个特点，彭颂声有一些作品曾经获奖。《屐音》、《悠悠新春乐》、《别梦依稀故友情》等小品，就都有感情真挚，如诉衷曲的特点。

这个集子中，部分是作者以记者的身份写的报告，它们有些写得很好；有些就写得粗糙一些，有待改进了。

我期待着彭颂声今后在文学上更大地迈步。“人到中年万事休”这句话，不但误人子弟，也“误人父兄”。生无所息，贡献和学识日有进境，是很可贵的。中年，在我看来，正是成熟的年华，从事文学工作的，真正不断有收获的是在生命的这个阶段。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努力耕耘，必有更大的收获。

1988年5月，广州

目 录

序 秦牧 (1)

第一辑

悠悠新春乐	(3)
友爱·关怀·扶掖	(7)
别梦依稀故友情	(18)
屐音	(24)
初访南方制药厂	(28)
铁道卫士们	(32)
健康二字值千金	(35)
得安先生	(39)
在特区,可以有更大的奉献	(41)
当今石秀	(45)
老教授的慧眼盯着“窗口”	(49)
路坎坷兮策马行	(51)
翰墨丹青赤子心	(65)
邂逅“怪人”杨守谦	(68)

心里充满着爱	(72)
陈寂教授的幽默	(76)
欢乐园听歌记	(80)
啊, 广州起义纪念碑	(83)
黄总周年祭	(87)
笑声·哭声·脚步声	(92)
文化翻身曲	(96)
一封情书	(102)
两个同龄人在握手	(105)
埔尾北里有名医	(108)
寒梅一幅溢清芬	(111)
布吉酒楼记趣	(116)
荔枝佳宴迎宾来	(120)
“幽谷一泉唱, 花山百鸟鸣”	(123)

第二辑

牛, 牛, 牛	(129)
从别名说到借代之类	(140)
造诣原从血汗来	(145)
“乃川”、“拔仁”及其他	(150)
岂独骚人始善诗	(154)
一桩往事	(157)

金钱三章	(160)
鹦鹉·画眉·粪缸鸟	(164)
自跋	(166)

第一辑

悠悠新春乐

如果那些喜欢把美女喻为解语花的古人还活着，那么，我真想邀请他们枉驾前来我这寻常百姓家，品评一下阳台上的花队。

你瞧，茶花红啦，杜鹃啦，桂花啦，玫瑰啦，芍药啦，金桔啦，一品红啦，簕杜鹃啦……齐刷刷的，一字儿排开，那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解语花哩！每当下班归来，站到那姹紫嫣红、芬芳扑鼻的花队旁，刚刚轻吟出鲁迅诗中的锦句——“屋后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我就依稀听见花儿们的窃窃私话：“嘻嘻，瞧他这股乐劲儿……”于是乎，一天的案牍之劳就驱除殆尽，顿觉周身异常爽快。

又是一天下班后。不必烦劳四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的提醒，我也知道深圳人民已经在兴高采烈地送虎年，接兔年了。孩子们穿着称心如意的新装，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迎春文艺节目，不时发出一串串笑声。妻子正在厨房里烹饪着团年晚餐。那炸鱼啦，蒸鸡啦，我们客家人嗜吃的传统好菜酿豆腐啦……都竞相把美味儿一阵紧似一阵地飘送到客厅来，令人不偷咽口水就忍不住嘴馋。而我，稍歇一会，就习惯地提起灌满了的喷水壶，匆匆到阳台上去

给花儿浇水，向它们吟吟诗，说几句悄悄话。

借着夕阳的余辉，我瞥见花叶上、花瓣上都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不知怎的，“感时花溅泪”这五字句便油然涌上我的脑际，挂在我的唇端。不过，我知道，我确实知道，此时此刻，它们所溅的决不是摧人肺肝的悲泪，而是滴滴由衷的喜泪和热泪，还是胜似虔诚的宗教信徒那样的祝祷辞。

是啊，花儿也为我感奋。它们不但美化着我的生活，而且幻化为一把多功能的熨斗，在熨平我额上和心中的皱纹。因为在我命途多舛的前半生，需要熨平的东西实在太多。就说上一回迎兔年吧，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时辰，我却绝对没有抱瓮养花的闲情逸兴。远地的同事无论钱包是胀是瘪，都早已高挂归帆而去；我呢，家在六十里华里外，虽然归心似箭，但也不得不羁留在属于我青春墓地的那个山间小镇。天，阴沉沉的，刮着寒风，下着冻雨。我忍受着关节炎发作的痛楚，一瘸一拐地穿过田头小径，去敲开答应给我借粮的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门。岂料他不在家，我扑了个空。在踅足回小镇的路上，我象一只受惊的兔子，四顾无人荒野静，这才斗胆地即兴抒怀：

凄风苦雨步维艰，
心念妻孥急“状元”*；
到底无如天国好，

油盐柴米不需钱。

好在游腻了大街，戴够了纸帽，殷鉴铭心镂骨，
我不会轻易形诸笔墨，也不会诉诸唇舌。当下默默地回到镇上，我买了二十斤番薯送回家去，权作团年饭的主粮，但心里还是“念念有词”：“唉，从来富贵珍馐味，不入寒酸筭蕨肠！”所幸菜根虽硬牙根健，我似乎并不太过悲苦。

想当年，老二在举家饥馑中诞生，我特意给她起名叫“荣安”。待她稍为懂事，我就常常审视着她那布满菜色的脸，殷殷嘱咐：“孩子，要记住，爸爸在你的名字上寄托着对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热切希望啊！”应该说，不是天意，而是人意：今天，在党的开放改革政策的春风吹拂下，祖国果真日益繁荣富强、人民果真日益安居乐业。深圳特区的崛起腾飞众多“开荒牛”的扬眉吐气，就是再雄辩不过的事实。不久前，那位当年的大队书记出差来深圳，访问了我的家。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禁再三讴赞社会主义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说：我只是知识分子海洋中一滴水，但也知道幸福的源头在哪里。自然，我还告慰他：生活是改善多了，而要更上一层楼，务必跟全国人民一道继续艰苦奋斗，用心血和汗水去营造永驻的春天……

女儿荣安走出阳台，催我进晚餐，问我在沉思些什么。打量这个初中生一身入时的服饰，再瞅瞅她

红扑扑的圆脸庞，简直可与眼前的花儿媲美，我便乐乐呵呵地打趣道：“好漂亮啊，知春惜春的二小姐！”她反笑爸爸老天真。微风过处，那一队奇葩异卉都频频点头，仿佛在说：“悠悠新春乐，我们解，我们解！”

1987年2月

注：*当地土话，“状元”与“撞年”谐音。“撞年”者，撞破头皮去觅过年的食用也。在那艰难的岁月，除夕前人们是常常自称“当状元的”。

友爱·关怀·扶掖

广州华侨新村有一条友爱路。

“友爱”这个温馨的字眼，留给了我难忘的记忆，使我深深地眷恋。

友爱路的一侧，一套简朴的三房一厅里，居住着秦牧和他的夫人吴紫风。

秦牧，这位当代著名散文作家，经历过“文革”的灾劫，恢复工作之后，除了日常的编务（每月起码要看一百几十万字的稿件）以外，还要应酬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接受记者采访，出席各类会议，收看恳求代为修改的习作，解答读者的来信……这样，留给他的所谓“业余”时间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为了补回丢失的十年时间，他总是不计昼夜，伏案耕耘，写出一篇篇、一本本的作品……

他虽年逾花甲，但仍然努力工作。工作，只有工作，使他感到生命的无比充实，乐悠悠地将整个人生奉献给人民的文学事业。

秦牧是异常勤奋的，同时，又是十分谦和的。他一身正气，铁骨铮铮，每每令我感动不已。

他历来认为开口称官是低级趣味，不如称“同志”亲切。他不喜欢别人在信封上写他的职衔，认为

“这在一个文艺单位大家是很不习惯的”。参与审阅、修改的稿子，他绝对不会接受联合署名的建议，说这里“包含着极不健康的因素”，心甘情愿当一个“为人作嫁”的无名编辑。对于一个作家声望、地位的高下，他也看得很平常。他曾在给我的信上批评我“有些‘读书高’的意味”，语重心长地说：“实际上一个劳动者，劳动了一辈子，也就是对人民作出了贡献，有无著书立说，其余事耳。在我心目中，人民的作家也不过是劳动者中的一员而已。”七十年代中，面对个别混迹出版编辑部门的人受贿发表“后门作品”的现象，他是非常愤恨的。他对我说过：“至于我们个人，一万斤鱿鱼也不能使我们违反原则去发表一首小诗。那些保持着小业主灵魂的人们的猜度是很可笑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多少经过锻炼和考验的人真正的历史；过去我是整千元整千元地捐献稿费作党费，甚至嫌工资过高，自己要求降低了工资的。”他在1980年11月给我的来信中也有这样的话：“我‘文革’前为了嫌自己工资过高，曾自动要求并获得减少，还交了不少稿费作党费。”即使在“红色恐怖”时期他也总是说真话，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面对当时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局面，他在来信上说：“文艺，当前确是不够活跃。”大胆地抨击了八亿人口八个戏的状况，不怕再次挨棍子。对所谓“三突出”的金科玉律，他在信中说“很多事物，一